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田汉：走向民众的先锋

陈思

田汉因国歌词作者的身份为人熟知，他同时还留下了体量庞大的戏剧戏曲、电影、诗词等作品，用文字、声音、影像等多种媒介，记录下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中的情感“颤栗”和“生之意志”。他投身戏剧运动，深度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创生，被复衍誉为“现代的关汉卿”“中国的‘戏剧魂’”。考察田汉的一生可以发现，他不仅是中外文化碰撞中产生的一代文化巨匠，更是走向民众的先锋艺术家。

携手中日青年投身社会进步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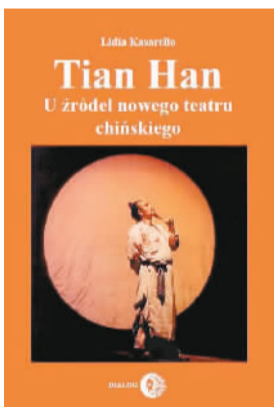
1916年，田汉赴日留学，并于1920年进入当时日本英语教育改革的重镇——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田汉扎实的英文功底，正是在这一时期打下的。他翻译了大量欧洲戏剧作品，如《莎乐美》《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但田汉对培养实用主义英语精英、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英文教育保持着警惕，他的频繁缺席与最终退学，反映出那一代留日学生并非完全被动接受日本的大学教育，而是同时保持着鲜明的独立人格。

与此同时，日本为田汉打开了一扇接触世界文学与各种社会思潮的窗口，提供了参与社会运动的政治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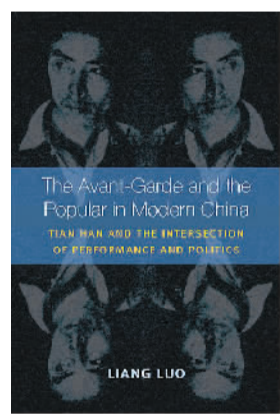
“新人哟！新人哟！请等一等！如此匆忙要往何处去？”“我要到人民中去，人民正翘首以待。”“哎呀！哎呀！既是同路我们一道去吧。”这几句诗节选自《少年与新人的问答》，1920年1月刊载于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机关刊物《同胞》第4号。时值新人会成立2周年，田汉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向新人会赠诗。诗歌表达了中日两国青年学生渴慕“新精神”，愿共同搭建“人间桥”、同“到人民中去”的心声，象征着20世纪早期中日青年学生间的志同道合与深情厚谊。

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是1918年至1929年日本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也是社会活动家的摇篮。田汉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与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的成员，在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的访日活动中承担了翻译工作，成为中日青年交流互动的桥梁。

田汉不仅与新人会联系密切，还加入了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可思母俱乐部。这是一个由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东亚各民族知识分子组成的组织，活跃于1920年至1923年间。中国的李大钊、俄国的爱罗先珂、朝鲜的权熙国以及日本的堺利彦、宫崎龙介、大杉荣、秋田雨雀等皆是其成员。田汉在这个组织中结识了一批社会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他在日本从事的这些社会进步活动，



▼《先锋主义与流行文化——以田汉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戏剧的根源——田汉》

为日后投身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国际左翼视野下的先锋戏剧实践

田汉的先锋戏剧实践致力于表现现实、介入现实，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剧作家在日本的经历和受日本戏剧运动的影响分不开。另一方面，田汉借由日本，接触到当时世界最前沿的戏剧潮流，尤其是国际左翼戏剧。

1927年，苏联举行了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会。这是一次国际左翼的盛会，苏联从43个国家邀请了947位代表，会上成立了“苏联之友会”，以共同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威胁。日本左翼戏剧家秋田雨雀与小山内薰与会，并重点考察了苏联的戏剧演出情况。当时，田汉急切地想了解十月革命后苏俄戏剧和电影的最新情况，1929年秋田雨雀所著《年轻的苏俄》一出版，他便马上译介了书中有关内容。

在秋田雨雀对苏联戏剧的介绍中，田汉尤为注重蓝衣剧团。秋田雨雀赞赏蓝衣剧团是“由劳动者自身上演的移动演剧”，令其震撼的是，“观众席七成的人们，大抵是职业工会的劳动者和从业人员”。换言之，蓝衣剧团的观演方式，解决了先锋戏剧难以真正深入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民众的问题，这恰恰是田汉与日本戏剧运动家小山内薰的民众戏剧运动所苦苦追求的。田汉通过秋田雨雀，了解到蓝衣剧团，并广泛汲取日本左翼剧场的演剧经验，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的开展做了理论储备。

此外，田汉尤为关注以特列季亚科夫编剧的《怒吼吧，中国！》和梅耶荷德戏剧为代表的舞台艺术，以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十月》和普多夫金的《母亲》为代表的电影艺术。1929年末，在汲取苏俄戏剧与电影理论资源的同时，田汉所领导的南国社与日本新剧创始人小山内薰所组织的日本筑地小剧场先后开展了表现主义先锋戏剧实践，力求从20世纪早期这场“共鸣的危机”中突围，召唤出剧场内外全新的观演革命。田汉带有浓厚表现主义色彩的剧作《一致》，保留着他这一时期实践探索的痕迹。

应当注意到，以田汉为代表的先锋艺术家在20世纪早期进行的先锋戏剧实践，并非19世纪末欧洲先锋派运动扩散至东亚的余波，而是始终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连。其诉求从不是脱离民众，创作高蹈、晦涩难懂的艺术；反之，民众视野是其重中之重。

“田汉研究”的世界之旅

田汉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田汉研究率先引起日本学者关注。1997年，小谷一郎、刘平主编，伊藤虎丸监修的《田汉在日本》出版。这是目前有关田汉与日本最完备的资料集。从中可以看到，20世纪早期，田汉就走进了日本观众视野。1920年，剧作《灵光》首演于东京。20世纪30年代，日本《满蒙》杂志多次连载译介田汉的《午饭之前》《名优之死》《咖啡店一夜》等剧作。此外，《孙中山之死》《火之舞蹈》《阿Q正传》《关汉卿》皆有日译本。1936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演出了田汉改编的《复活》等剧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田汉是颇受日本文坛关注的中国作家，他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日本作家交往甚密，成为中日作家的纽带。1927年，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牧近江到上海调查“四·一二”事件时，田汉为其题词“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家联合起来”，后发表于日本左翼刊物《文艺战线》上。同年，日本各大报纸相继报道了“中国新兴文坛的代表作家”田汉再度来到“第二故乡”东京的消息。小谷一郎认为，“田汉1927年6月再度来日时，一天之中就与30多名日本作家欢会，这也是非田汉莫属了。”

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夏，田汉应邀将独幕剧《午饭之前》改译为日文发表于日本《改造》杂志，谷崎润一郎帮忙作了校对。盛赞中国“南有田汉”的日本作家



田汉发表《少年与新人的问答》的刊物《同胞》。

金子光晴从中读出了“热烈的、激愤慷慨的气魄”，看到了“真正的悲剧的调和和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田汉的一面”。彼时恰逢五卅惨案一周年，田汉实际上想要通过这部作品向日本社会直接言说，以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工人罢工运动。

在国际左翼文学思潮勃兴的“红色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引发世界关注，田汉戏剧也进一步进入海外观众视野。他创作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漂洋过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经典歌曲，尤其风靡东南亚。美国黑人歌手罗伯逊还演唱了英文版。在朝鲜，中国戏剧译介先驱金光洲高度关注田汉，译介了《湖上的悲剧》。朝鲜学者、翻译家丁来东盛赞《湖上的悲剧》“堪称艺术精品”，并于1935年译介了田汉的《江村小景》。

青年时代，田汉痴迷俄国文学，深受十月革命感召，也因此引起俄语世界关注。俄语世界自1949年起多次译介刊登《义勇军进行曲》，并于1959年和1990年分别翻译出版剧本《关汉卿》与《谢瑶环》。此外还有两本研究专著：尼科尔斯卡娅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田汉与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和阿芝玛穆索娃1993年出版的《世纪背景下的田汉肖像》。尼科尔斯卡娅将田汉视作“中国国际文学的奠基人”，认为“田汉关注的不是某个国家民族的特殊性，而是整个人类社会”“阿比西尼亚的母亲所遭受的折磨和苦难，与中国的母亲在同样情况下所承受的并没有什么区别”。

德语世界对田汉的译介始于20世纪80年代，独幕剧《南归》率先被选编进《中国现代剧作》一书。而后，田汉作品的德语翻译主要集中在《袖珍汉学》杂志上，《咖啡店一夜》《生之意志》《薛萝之鬼》《江村小景》等作品也陆续译成德语。其中，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马海默是主要译者。

海外田汉研究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较为活跃，随后较为沉寂，近年来又有回温之势。2014年，中国学者罗靛出版了第一本田汉研究英文专著《先锋主义与流行文化——以田汉为中心的考察》，倡导在国际先锋主义视域下探讨田汉在政治与美学上的先锋性。2015年，波兰学者孔莉娅出版了波兰语专著《新中国戏剧的根源——田汉》，评价说“中国新戏剧模式的采用和创造性改编的过程，与被国内外普遍称为‘中国现代戏剧之父’的田汉直接有关”。

田汉的独特意义在于，他始终在民众视野中开展先锋戏剧实践。换言之，田汉的先锋性在于孜孜求索于戏剧艺术如何改变底层劳动者生活，改变生产关系，并通过戏剧参与广阔的历史实践中。因而，他追求的绝不是精雕细琢地留下一部不朽之作，而是借助有限的条件，介入动荡繁复的现实，以戏剧运动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这也是他受到世界尊重的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惊天动地事，隐姓埋名人。短短十个字，却是众多密码破译人员一生的写照。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这样一个技术侦察情报部门——中革军委二局（全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长征的胜利与其密不可分。但由于情报工作的保密性，他们的贡献一直鲜为人知。庞贝的长篇小说新作《乌江引》，让这些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功绩，走入大众视野。

《乌江引》以“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为原型塑造人物，揭开了长征路上中革军委二局密码破译工作的神秘面纱，再现了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等著名战役的惊心动魄和“用兵如神”。小说中，曾贇、曹大冶、邹生等主人公利用早期无线通讯技术侦收敌台信号，几乎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所有密码情报，为红军长征途中一次又一次突破重围、绝处逢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乌江引》由“速写”和“侧影”两部分组成，“速写”是中革军委二局的战地笔记，充满了长征行迹途中的现场感，“侧影”是革命者后代对历史的寻访，再现了长征精神的延续传递。“速写”中使用“我们”这个给读者以代入感的人称，“侧影”部分则扩展到了更大的历史时空，二者结合，呈现出“亦文亦史，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

《乌江引》所写的长征时期的中革军委二局，是我曾服役的总参某部前身。创作这部小说既是向革命前辈致敬，也是对自身青春岁月的缅怀。而近些年解密的历史资料也为我提供了充足的写作资源。”庞贝说，希望在惨烈的战况描写和紧张的密码战中呈现出某种温情，“这是一种真诚的抒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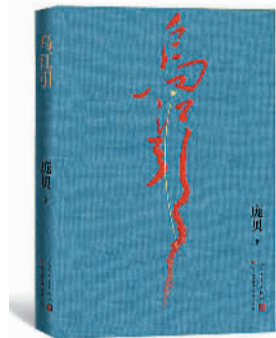
《乌江引》的创作基于准确可考的史实，这给作者预留的想象和虚构空间其实并不大。但庞贝决心将这个题材写成具有“文学含量”的小说，一部在叙事上具有独特结构、视角、语感和节奏的小说，一个独具审美价值的文本。在史实基础上，作者用文学笔法和虚构能力纤毫毕现地还原出历史细节，又呈现出重拾记忆、抵抗遗忘的感受。他的努力为革命历史题材提供了另一种书写角度和文学样本，得到评论界认可。

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库，长期以来，这类作品形成了一定的叙述模式，《乌江引》采用了另一种叙述模式，大胆地在纪实与虚构间闪转腾挪。评论家傅逸尘对《乌江引》的艺术特色评价说：“虚构现场和纪实文本融合，宏大故事与幽微细节嵌套，历史现场与当下现实勾连，这一切都彰显出作者的创新能力。”

“记忆与遗忘”是《乌江引》的隐含主题。那些破译者无疑是记忆力超群的人，他们因工作性质必须记住一切，但又隐姓埋名于历史长河。在另一个时空，今人的寻访打捞出的历史碎片，又呈现出重拾记忆、抵抗遗忘的努力，而这正是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最深切的缅怀。《乌江引》的最后有一首小诗，“时间的深处/有一种静默/那是水中的星光/是风中的密息”。曾希圣、曹祥仁所获得的代表巨大荣誉的红军奖章在战争期间落入水中，成为了“水中的星光”，但历史终究被铭刻。“在长征密电全面解密之后，我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这个传奇，是一种致敬，也是一种告慰。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庞贝说。

黄雨寒

讲述长征密码破译传奇



《乌江引》

◎新作评介

叙写父子间的“双向成长”

——读肖复兴长篇儿童小说《春雪》

赵振杰



2015年，以《丁香结》的发表为标志，散文名家肖复兴开始尝试儿童文学创作，随后几年相继出版了《红脸儿》《合欢》《兄弟俩》3部长篇儿童小说，受到业界和读者好评，有评论家称之为肖复兴的“童年三部曲”。就在大家认为《兄弟俩》可能是其儿童文学创作的收官之作时，新作《春雪》不期而至。

虽然《春雪》讲述的依旧是发生在老北京大杂院里的儿童成长故事，但与“童年三部曲”不同的是，作者这次不仅将笔墨集中在“父子”上，更以“儿子帮爸爸戒掉酒瘾”为故事线索，巧妙地完成了父子角色的互换。肖复兴在《春雪》后记中说：“从文化的角度，重新来回顾和审视父子，扩而言之家长和孩子的关系的话，一般都会经历‘前喻文化’即家长教育孩子，‘并喻文化’即家长和孩子相互教育，‘后喻文化’即孩子反过来可以教育家长这样三个阶段。”这让《春雪》不

再只是“三娘教子”，而是来了一回“子教三娘”。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实现了从“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的自觉转变，也使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双向“成长性”。乖巧懂事的男孩三江有个嗜酒如命的爸爸，妈妈多次规劝无果后一气之下回了娘家。面对即将支离破碎的家庭，小小年纪的三江下决心帮爸爸摆脱那如影随形的酒瘾。在一次次与爸爸的“斗智斗勇”中，三江逐渐由温室里的花朵蜕变为坚强的小男子汉。在儿子的监督下艰难戒酒的过程，也是三江爸爸走出心理阴霾，直面人生缺憾的“再成长”过程。作者通过父子身份的戏剧性互换，使两个主人公在这个从摩擦不断到相互理解的温情故事中共同拥有了清晰可见、令人信服的“人物弧光”（指人物本性的发展轨迹或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春雪》中的“人物弧光”不仅通过“故事”呈现，更通过“心事”来呈现。小说没有什么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情节，藏在每个人物潜意识中的那些浓得化不开的“心事”才是叙事的核心驱动力。小说写道：“山区的夏夜那么宁静，却又翻腾着这么多心事，像这夜空中的星星密密麻麻的，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心事，只是相互望着，不说一句话罢了。”而这些“心事”又与人物的“记忆”或“梦呓”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它是三江为妈妈默默许下的承诺，是三江爸爸挥之不去的痛苦往事，是建国叔和明秋妈心照不宣的秘密，是夏爷爷和夏奶奶见到明秋时内心的五味杂陈……这些欲言又止的“心事”，使人物时常处于欣喜与落寞相交织的复杂心境或情绪中。例如，当发觉爸爸内心深处还埋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史时，三江似乎对爸爸的酗酒多了几分理解。作者巧妙采用儿童的限制视角来勾勒三江此时的微妙心情：“大人的心思就是和小孩子不一样，他们总是把一些事情，尤其是过去的旧事，像用过的一个旧竹帘子，卷起来，藏起来，不愿意对小孩子说。”正是在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中，故事的神秘面纱被层层剥开，三江爸爸的人物形象也由此逐渐丰满、立体起来。

肖复兴在小说《后记》中说：“照本宣科地讲述一个生活中常常会出现的父子之间矛盾与斗法的故事，没有多大意思。在故事之外，还有一层迷人的东西，亦即雨果所比喻的‘比天平更高级的还有七弦琴’。我更关心的是如何找到这样的七弦琴，哪怕一点点也好。”显然，这把“七弦琴”就埋藏在人物的重大“心事”中。在笔者看来，“心事”与“故事”不同，“故事”指向外部世界，而“心事”诉诸人物内心。如果前者对应的艺术形式是镜头下的高清影像的话，那么后者则类似于一幅幅纷乱的人物素描。相对于“影像”，“素描”并不在意事物的逻辑、理性、因果律，它所关切的是诉诸主观感受的东西，诸如语调、感情、情绪、气息、氛围、味道、节奏、韵律等。如此看来，《春雪》所描述的对象就不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一事，而同时是无数人、无数事，一件事涉及另一件事，一个人牵涉出另一个人，像水面荡开的波纹，又像花朵编织的花环。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春雪》是一本讲述父子亲情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品，毋宁说它是一部充满“心事”的双向“成长小说”。

（作者系河北师大文学院博士）

冯骥才《俗世奇人》推出手绘珍藏本

本报电（张笑瑞）《俗世奇人》是作家冯骥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国内外公认的小小说经典。20世纪90年代，冯骥才在文化遗产保护之余，开始创作表现天津奇人绝技的小说作品，集腋成裘，形成丰富的“俗世奇人”系列。这类作品风格统一、人物活灵活现，充满传奇色彩和生活气息，展现出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地域风貌、风土人情、生活风尚，也记录下中国民间技艺的精妙。

冯骥才不仅是作家，也是画家。他曾说：“《俗世奇人》中这些人物的脑袋是我脑子里生出来的，我知道他们的脾气秉性，挤眉弄眼是什么样子的。”在跨越30年的创作历程中，冯骥才随写随画，保存了大量“俗世奇人”手稿和绘画草稿。这些珍贵的资料，如今被收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俗世奇人：手绘珍藏本》中。它们不仅记录了作者的创作思路和瞬间灵感，同时也具备较高的审美和收藏价值。此外，冯骥才还为新书精心绘制了20余幅彩墨插图，描绘出“苏七块”“刷子李”“蓝眼”“酒婆”等人物形象，意趣盎然，活灵活现。

